改革开放以来深圳诗歌精神的三个面向

赵目珍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广东深圳

【摘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性城市，深圳四十多年来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也孕育了独特的诗歌景观。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深圳诗歌文本的阅读，结合深圳四十多年来的社会文化转型，可以发现深圳诗歌精神呈现出三个核心面向：其一，先锋实验与思想策源，表现为诗学观念的革新与语言形式的探索；其二，疏离体验与疼痛书写，聚焦于移民身份、打工生存与精神漂泊的书写；其三，日常经验与在地重构，体现为对城市日常生活的凝视、在地诗学的建构以及本土历史记忆的打捞。这三重面向并非线性更替，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侧重、相互渗透，共同凝聚出深圳诗歌既充满时代张力又富有个体深度的精神气质，也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城市书写提供了独特的文学经验。

【关键词】深圳诗歌；改革开放；先锋实验；疏离体验；在地重构

【基金项目】本文系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5 年度学科共建课题“湾区视野中深圳文学经典的发生及其与城市人文精神的互文性研究”（SZ2025D048）成果。

【收稿日期】2026 年 9 月 29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10 月 21 日 【DOI】10.12208/j.ssr.20260335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poetic spirit of Shenzhe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Muzhen Zhao

Shenzh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Abstract**】As the iconic cit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Shenzhen has not only generated an economic miracle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but also fostered a unique poetic landscape. By examining a large body of poetic works produced in Shenzhe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contextualizing them against the city’s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ree core dimensions of Shenzhen’s poetic spirit. The first is pioneering experimentation and intellectual origin, manifested in the innovation of poetic concept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linguistic forms. The second concerns the experience of alienation and writing of suffering, centering on migrant identity, the survival of migrant workers, and spiritual wandering. The third lies in everyday experience and local reconstruction, embodied in the gaze upon urban dail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poetics, and the reclamation of local historical memory. These three dimensions do not follow a linear progression. Instead, they carry different emphases and interpenetrate one another across historical stages, jointly shaping the spiritual temperament of Shenzhen poetry. This poetic temperament is marked by contemporary tension and profound individual depth, offering unique literary experiences for urban writing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Keywords**】Shenzhen poetry; Reform and opening-up; Pioneering experimentation; Experience of alienation; Local reconstruction

作为一座因改革开放而生的城市，深圳常被视为“经济特区”的代名词。然而，在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表象之下，其文化肌理与精神生态同样经历了剧烈而深刻的重塑。诗歌作为最敏感、最贴近心灵的语言艺术，可以说率先记录了这座新城市的精神脉动。四十多年来，一大批深圳诗人如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孙文波、黄灿然、谢湘南等，写出了大量优质的诗歌文本，清晰地展现了诗歌精神随城市变迁而演进的轨迹。这些作品，不仅是一部城市诗歌的断代史，更是一部以诗为鉴的“心灵编年史”。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深圳诗歌文本的阅读，结合深圳四十多年来的社会文化转型可以发现，深圳

诗歌精神主要有三个核心层面的向度：开拓与实验的先锋性、流动与边缘的现代性体验、日常与本土的诗性重构。当然，这三重面向并非时间上的线性更替，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侧重、相互渗透，共同凝聚出深圳诗歌既充满时代张力又富有个体深度的精神气质。透过这些诗歌，我们不仅能看到一座城市的快速发展，也能窥见一代人在时代演进中的心灵变迁。

1 先锋实验与思想策源

深圳诗歌的起点，与这座城市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定位不无关系。1980 年代，深圳不仅是经济政策的先行区，也一度成为思想解放与文学实验的“策源地”。这一时期的诗歌，呈现出鲜明的开拓意识与形式实验的先锋性，其核心动力源于对旧有话语体系的突破和对现代性精神的自觉追求。

理论倡导与诗学观念的革新为先锋写作奠定了基础。1986 年，定居深圳的诗人兼批评家徐敬亚联合安徽的《诗歌报》，以《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为阵地发起了“中国诗坛 1986 现代诗群体大展”。这场在当年被视为文化思想界“火山喷发”的运动，其策源地选在深圳并非偶然。正如徐敬亚后来所言：“任何事件必须有一个支点，也必须有很多助力。这支点，就是《深圳青年报》；那助力，就是人们对深圳这座无所不能城市的想象。”[1]深圳当时所代表的“新观念”与“可能性”，为这场旨在打破旧秩序、建立新规范的诗歌运动提供了合法性与精神气场。徐敬亚自身的诗论《崛起的诗群》虽成文于赴深之前，但其对朦胧诗美学的辩护与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呼唤，与深圳早期开放、探索的氛围内在相通。

读徐敬亚写于 1985 年的《一代》，那种决绝的宣告至今仍有冲击力：“第一粒雪就掩埋了冬天/皮鞋疯了/无法找到你！/还没有来得及指点/手臂就消失了”。很显然，作者的重点不是写雪景，而是写一种精神上的断裂与新生。诗中接着写道：“我是慈善如火的人/我是无法预测的人/在放声大笑前，我被/突然雕塑/奔向何方”[2]。这种对自己的不确定，对方向的迷茫，恰恰是那个年代最有力量的东西——不是有了答案才出发，而是出发去寻找答案。而诗的结尾更见力度：“就在这里/钉下一颗钉子/我是无法再生无法死去的男人”。这种充满悖论的自我宣告，正是那一代诗人告别历史重负、寻求精神新生的写照。值得注意的是，徐敬亚此前还有一首写于 1980 年的《既然》，同样体现了这种面对未知时的决绝：“既然/前，不见了岸/后，也远离了岸//既然脚下踏着波澜/又注定，终生恋着波澜……那么/就把生命交给海吧/交给远方/没有标出的航线”[2]。“没有标出的航线”这几个字，几乎就是那个年代深圳精神——前方没有现成的路，路是走出来的——最准确的诗歌表达。

早期深圳诗人群体以鲜明的现代主义姿态，进行着语言与精神上的双重探索。王小妮 1988 年写于深圳的《半个我正在疼痛》，把身体的疼痛写得惊心动魄：“有一只漂亮的小虫/情愿蛀我的牙//世界/它的右侧骤然动人。/身体原来/只是一栋烂房子”[3]。把身体比作“烂房子”，把蛀牙的小虫说成“漂亮”的，这种反常的视角和冷峻的语调，告别了此前诗歌中常见的抒情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不认识的就不想再认识了》，这首诗写于同一年，开头便说：“到今天还不认识的人/就远远地敬着他。/三十年中/我的朋友和敌人都足够了。”[3]这种自我封闭的姿态，看似消极，实则是经历了某种精神消耗之后的清醒选择。诗的最后写道：“从今以后/崇高的容器都空着。/比如我/比如我荡来荡去的/后一半生命。”“崇高的容器都空着”，这句话放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语境中，意味深远。它意味着对现成答案的悬置，对宏大叙事的警惕。这种向内转的写作姿态，正是深圳早期诗歌告别颂歌模式、转向个体精神开掘的典型表现。

“边缘”诗学观念的提出与实践，标志着深圳诗歌的先锋性从自发走向自觉。1996 年，以乌沙少逸、光子、安石榴等人为代表的诗人出版诗合集《边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明确提出“边缘”的诗学立场。他们在序言中宣称：“我们在地面上行走……被另一类‘我们’坦然地放逐，进入生存的边缘地带。”[4]这里的“边缘”，既指涉诗人在当时社会中的位置，也指向一种自觉的写作姿态。他们甘于在主流之外，进行生存与语言的双重勘探。安石榴在诗合集《边缘》中的诗作，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边缘”意识。他的《写作》一诗写道：“我必须有一点长处/比如写作。卑微地生活/在别人的城市/热爱工作和朋友/在房间里坚持喝水/放一点儿音乐/让日常得出规律/要内心充满自由”[4]。诗歌表面上写的是日常的卑微，实际上写的是写作作为一种精神抵抗的方式。“别人的城市”这个说法，后来成为深圳移民书写的一个核心意象。而“要内心充满自由”这句话，在商业大潮席卷一切的年头，更是具有一种举足轻重的分量。安石榴的另一首诗《饮水》，写的是更内在的体验：“饮水/在充满焦渴的午夜/我对着一只杯子/大声地哭泣//是水进入了我/还是我进入了水”[4]。这种物我界限的模糊，身体与外部世界的交融，正是“边

缘诗群”所追求的“生存与语言的双重勘探”。他们不满足于描写生活，而是要进入语言的内部，在词语的层面完成对现实的重新理解。

总体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深圳诗歌的先锋性主要体现在：借助城市独有的“实验场”氛围，成为全国诗歌变革的思想策源地之一；同时，诗人们以现代主义手法，率先表达了个体在时代转型中的精神觉醒与困惑，并通过对“边缘”等诗学立场的自觉诗歌实践，捍卫了诗歌在功利主义时代的独立价值。这为深圳诗歌奠定了敢于突破、重视精神探索的初始基因。

2 疏离体验与疼痛书写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深圳以其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移民。这座“移民城市”的主体构成，决定了其诗歌书写的核心经验之一必然是流动、迁徙与由此产生的疏离体验。诗歌成为记录打工者生存状态、抒写城乡矛盾、表达身份焦虑与精神漂泊的重要载体。这一面向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至 21 世纪头十年尤为突出，构成了深圳诗歌最具现实关怀与时代痛感的篇章。

深刻描绘“打工者”的生存现场与身体经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是这一时期诗歌的重要特色。谢湘南出版于 2000 年的诗集《零点的搬运工》（华夏出版社），其同名作品写道：“有人睡眠/有人拿灵魂撞生命的钟/有人游走/有人遥望月球而哭泣//时间滑过塔吊飞作重击地心的桩声/一切都是新的连同波黑的静默/不需叉车歌声高过高楼/搬运工寻找动词，鲜活的//鲤鱼，钢筋水泥铸造的灯笼/照亮孤独和自己，工卡上的/黑色，搬运工擦亮的一块玻璃迎接/黎明和太阳”[5]。这首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直接写搬运工的苦和累，而是用“寻找动词”来定位诗人的工作——搬运工搬运的是货物，诗人搬运的是词语。这种双重身份的叠加，让“打工诗歌”超越了简单的苦难书写，进入了对写作本身的反省。同一诗集中的《吃甘蔗》则更加直接地呈现了打工妹的生存状态：“那些女孩子总爱站在那里/用一块钱买一根一尺长的甘蔗/她们看着卖甘蔗的人将皮削掉/（那动作麻利得很）/她们将一枚镍币或两张皱巴巴/的五毛，递过去/她们接过甘蔗嚼起来/她们就站在那里/说起闲话/将嚼过的甘蔗渣吐在身边……在南方/可爱的打工妹像甘蔗一样/遍地生长/她们咀嚼自己/品尝一点甜味/然后将自己随意吐在路边”[5]。这首诗的力量在于它叙事上的不动声色。诗人没有站出来批判什么，只是把场景呈现出来，但“咀嚼自己”和“吐在路边”这两个表达，已经把打工妹被消耗、被丢弃的命运言说得异常清晰。甘蔗的甜与生活的苦之间的反差，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冷峻的张力。

程鹏的《安装插座》同样值得注意：“打工生活在持续不断地上涨着。春江词的水突然奔跑起来/三条螺丝钉的红鲤鱼被钳在他的老虎钳上。旋转/隔着龙门。一把江声的感叹词组//L 是火线，打工生活的主动词/N 是零线，打工生活不可或缺的副词/E 是接地标志，4 平方的双色线叹息的谓词//他的头皮发麻，短发直竖，神经绷紧/目光是一词坚定的螺丝/他在带电操作”[6]。把电工的技术术语——火线、零线、接地——转换成打工生活的隐喻，这是诗人找到的独特视角。火线是“主动词”，零线是“副词”，这种语法化的处理，把枯燥的流水线工作变成了一首关于语言和生存的诗。许立志的《流水线上的兵马俑》写于 2013 年，是这一脉诗歌的晚期代表作，也是最令人震撼的一首：“沿线站着/夏丘/张子凤/肖朋/李孝定/唐秀猛/雷兰娇/许立志/朱正武/潘霞/苒雪梅/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7]。把流水线上的工人比作秦始皇陵的兵马俑，这个比喻既精准又残酷。兵马俑是为死人陪葬的，而流水线上的打工者，某种程度上也在为某种庞大的事物陪葬。诗人把自己的名字也列在其中，是在告诉我们自己并非旁观者，而是一个当事人在讲述自己的“现场”经历。这种用排列名单方式制造出的效果非常震撼，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抒情方式，具有极大的冲击力。

敏锐地捕捉个人在城市中的“精神漂泊感”与身份认同的焦灼，也是这一时期诗歌的重要内容。女诗人邬霞 2007 年创作的《吊带裙》，从制衣厂女工的日常劳作入手，写出了一个打工妹在流水线上对远方陌生姑娘的隐秘祝福：“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8]。熨斗聚集“手温”这个细节非常动人，它承载的是女工身体里的体温，而非机器的冰冷。诗的结尾更耐人寻味：“而我要下班了……吊带裙它将被运出车间/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在某个下午或者晚上/等待唯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邬霞自述，她喜欢穿吊带裙，却没机会穿，要等别人都睡了才在窗帘后面换上。女工日复一日熨烫的吊带裙，是给城市里的姑娘穿的，她自己却穿不上；她把“安静的爱情”熨进裙子里，自

己的爱情只能在加班间隙悄悄想象。那句“陌生的姑娘，我爱你”，朴素而又心酸，像是打工者与这座城市之间一次温柔的和解。

郭金牛的《在外省干活》写得更直白：“在外省干活，得把乡音改成/湖北普通话。/多数时，别人说，我沉默，只需使出吃奶的力气”。语言上的自我改造，是移民经验中最常见也最深刻的部分。把“乡音改成湖北普通话”，意味着说话的方式要进行改变，连自己从哪里来都要“隐藏”起来。诗的后半段写得更沉痛：“岁末，大寒。表哥/淋着广东省的雨/将伤风扩大到深南东路、解放路与宝安南路。/地王大厦码到了 69 层/383 米高”[9]。地王大厦是深圳的地标，其 383 米的高度与“伤风”个体的渺小形成了鲜明对比。城市越来越高，而人的病痛和乡愁，只能在高楼之间的缝隙里蔓延。阿翔的《外省书》对深圳经验的书写同样值得注意：“夜晚醒来时的景象，马在地铁口，它不肯逝去/尾翼任风吹拂/和你盛开的衣衫没什么不同/在我左边轻轻碰触。在外省，沿路的一切东西都被收拾好了”[10]。地铁口的马——这个超现实的意象，把现代都市的快节奏与某种古老的东西并置在一起。而“外省”这个说法，也暗示了即使在这个城市住了很久，依然有一种“身在别处”的感觉。

这一面向的诗歌精神，其力量恰恰源于它的“疏离感”。诗人们都是生存意义上的漂泊者，他们选择各自的姿态进行观察与写作，从“亲历”的视角，记录了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中具体生命的悲欢离合，将宏大的“深圳奇迹”细化为无数个体的生存史诗。他们的写作，构成了这座城市精神记忆中不可或缺的沉重部分。

3 日常经验与在地重构

进入 21 世纪以后，深圳的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大量早期移民或其后代在此扎根，加上各种有利于移民落户的政策实施，深圳逐渐从“异乡”变为生存意义上的“家园”。相应地，深圳诗歌的精神面向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即从对外部变化和生存冲突的激烈反应，转向对城市内部日常生活的深度凝视、对城市本身的“在地建构”，以及对本土文化记忆的打捞与重构。诗歌开始致力于构建与这座城市的情感联结和意义认同。

这一面向的诗歌，首先转向对都市日常生活的细腻观察与诗意提炼，在平凡中发掘不平凡。王小妮在新世纪的写作愈发沉静内敛。她有一首写于 2005 年的《潮湿》，开篇写道：“看那些脚印，好像是被有意泼洒出去的。/就在这个早上/我一个人真的向厨房走了那么多遍？//一条散开的大竹扫帚，刚落地就闪出水光的烟花。/喷射机离开雨后大地前的那一刻/自杀式爆炸现场还没被清理过/水的炸弹。”[3]从厨房地上的湿脚印，写到“水的炸弹”，这个转换既突兀又自然。诗人的意图并非描写潮湿本身，而意在潮湿中发现了某种“隐形的线索”，即那些平时看不见的生活轨迹。诗的最后写道：“事实意外间暴露/看潮湿怎么出庭作证。”潮湿成了证人，证明“人这种伟大动物”在这个普通的早上“没做任何大事情”。这种把日常琐事上升为存在之思的能力，正是王小妮后期诗歌的核心魅力。《打杨桃》写于 2006 年，同样体现了这种日常书写的深度：“满树的杨桃让头顶很沉/让我们见不到天。//很快，几颗黄果子落到了手上。/现在，天空不仅更明亮/还更深透更浑圆。”[3]打杨桃这件事本身没什么稀奇，但诗人从这个简单的动作中，看到了时间的流逝和自我的分裂：“少年的我还是挂在树尖上/又轻又薄，离金黄还很远的那颗果子/恐慌地望着打杨桃的这一群。//我向上望着我，并不认识。”此刻的“我”和少年的“我”之间，隔着的不仅是时间，还有一种陌生感。“并不认识”这四个字，把一个人对自己生命历程的复杂感受写得淋漓尽致。

黄灿然 2014 年移居深圳洞背村之后，诗风发生了明显变化，变得更加日常、朴素、通透。《洞背村》一诗写的就是这种迁居带来的内心变化：“当内心平静变成干扰，/当我又要租房子，开始/小心量入为出（还不是/入不敷出，还不是欠债），/我就想起洞背村。/我突然鄙视起我这份/做了近二十五年的工作，/突然对办公室感到恶心，/对我的坐姿感到滑稽，/当我想起洞背村。”[11]这与其说是浪漫化的田园想象，不如说是一个在城市里工作了二十五年的人，对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渴望。“对我的坐姿感到滑稽”，这个细节尤其精准。一个人在办公桌前坐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突然有一天意识到这个姿势的荒谬。我们的诗人就这样在中年的某个瞬间，一下子觉醒了。他的《不上班多好》写得更直接：“不上班多好，在被闹钟叫醒的/那一刻！不快点起床，不快点/刷牙、洗脸、穿鞋袜、穿衣服，/可以继续睡或不睡，免除对世界的责任，/对别人的责任，对自己的责任。”[11]这几乎是每一个上班族都有的念头，但诗人把它写成了诗。更妙的是最后几句：“就像要是一生中/有那么几年、几个月、几天，/甚至几小时，甚至一刻钟/不做人多好！做一枝花一株草，/做一滴水一线阳光，啊，/哪怕做做别人！哪怕/做自己挂在墙上的/那件外套！”从“不上班”写到“不做人”，这个跳跃既荒诞又深刻。挂在墙上的外套比人更自由，这种反向思考，正是黄灿然后期诗歌的标志性风格。

如果说上述诗人侧重于日常经验的挖掘，那么另一部分诗人则致力于深圳的“在地建构”，即在具体的城市空间中安放身心。孙文波在深圳时期的写作，便体现了这种日常与在地的结合。他的诗集《马峦山望》以深圳东部马峦山为地理坐标，将古典山水诗的“望”的姿态带入现代都市边缘的日常观察中。在《洞背一日记》中，他写道：“山的豁口，海嵌在我的视线里，静止，/自然的泼墨，此时淡，彼时浓，都是绝景。/翘首者，看到悠远心绪，与天地融为一体，/是道德经实践。”[12]诗人站在马峦山中洞背村的某处，眺望山海，将眼前的自然景物与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相接。这种“在地”书写抛开对名山大川游历的观照，将每日可见的寻常风景提升为精神修行的场所，打破了以往同类题材诗歌的书写模式。诗中接着写道：“而俯首，尽是绿。万千纤细，下脚处，/寂静为声。听，成为多余之事。”从仰望到俯首，从宏阔的“绝景”到细微的“绿”，诗人以凝视的姿态，在深圳东部这一具体的山水空间中，完成了对古典诗学“静观”传统的现代转化。这种写作选择在城市边缘的日常栖居中发现山水、安放山水，其路径有别于离开城市去寻找山水，为深圳诗歌的在地建构提供了典型样本。

这一面向的诗歌，还积极参与对深圳本土历史与集体记忆的“打捞”与重构。当城市有了足够的时间纵深，对自身历史的追寻便成为必然。谢湘南的短诗《填海》以简练的笔触呈现了深圳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侧面。全诗只有六行：“大卡车将泥土和石块往海里倾倒/轰隆隆的声音传出很远//玉米地里/女人正掰着玉米棒子/黝红的脸庞映照天空，她不知道/天上的蓝色少了一块”[13]。前两句写填海造地，这是深圳城市化进程中最典型的场景。后四句却转向一片玉米地，一个女人正在掰玉米，她不知道“天上的蓝色少了一块”。这个“不知道”是整首诗的关键：她的劳作与被改变的土地之间，隔着无法弥合的距离。诗人没有直接批判，只是把机器与速度、身体与泥土并置的画面摆在那里。那“少了一块”的蓝色，既是天空对被填掉的那一部分海曾经映照的部分，也是某种完整性的缺失。通过这样的并置，诗歌把一段被遗忘的本土记忆打捞了出来。李亚伟的《蛇口记事》则把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与个人命运交织在一起：“1978年 10 月的某一天/共和国交通部外事局/黄庚在他的办公室里/起草一份内容奇特的重要报告/那一年我 15 岁，坐在文科班教室的第一排/女生们都 17 岁了，几个漂亮的同学姐姐/既不爱看书，也不爱正眼瞧我”。把国家大事和个人小事并置，是李亚伟一贯的手法。诗的后半段写到蛇口工业区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第一炮”，而诗人自己正在参加高考，“上午考数学，在低矮的小学课桌上我弯腰驼背/眼前一片茫然，几乎交了白卷/下午考历史，我一挥而就”[14]。这种个人命运与时代变革之间的微妙呼应，构成了诗歌最动人的部分。两首诗都以各自的方式，在语言的缝隙中留存了深圳发展进程中不易被言说的经验。

上述种种诗学实践，标志着深圳诗歌朝着更加成熟的现代性迈进。它意味着诗歌写作从对外部冲击的应激性反应，进入了更具自主性、建设性的阶段。诗歌从“呐喊”走向“沉思”，从“表现疼痛”走向“发现诗意”，从“无根漂泊”走向“在地安放”，完成了自身与这座城市更为复杂也更为深刻的融合。

4 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深圳诗歌精神的演进，经历了一个由先锋实验到疼痛书写再到日常建构的发展过程。其早期阶段，由于城市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独特定位，诗歌呈现出鲜明的开拓意识与语言实验的先锋性，其核心动力源于对旧有话语体系的突破和对现代性精神的自觉追求。进入创作中期，随着大规模移民潮的到来，诗歌的书写重心转向了流动、迁徙与由此产生的疏离性体验，充满了强烈的漂泊感、身份焦虑与现实关怀。到了创作后期，当深圳从“异乡”逐渐变为生存意义上的“家园”，诗歌的精神维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对外部变化的激烈反应，转向对城市日常生活的深度凝视、对城市本身的“在地建构”、对本土文化记忆的打捞与重构，表现出对诗意重建的精神努力。先锋实验、疏离体验与在地重构这三个面向，既是深圳诗歌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书写路径，也鲜明地映照着这座城市特有的精神气质。它们的生成，离不开深圳独特的社会土壤与文化逻辑，共同构成了深圳诗歌不可替代的诗学价值。

深圳诗歌的历程，是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精神变迁的一个微观缩影。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贡献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和文本，更在于提供了一种宝贵的文学经验。在一个以经济速度和物质积累著称的城市，诗歌如何可能？改革开放以来深圳诗人所创作的优秀诗歌文本，给出了他们的答案。诗歌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它记录发展也铭记代价，看见变革也抚慰伤痛，解构神话也重建意义。这或许是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留给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的一份独特而珍贵的精神遗产。

参考文献

[1] 徐敬亚. 那些日子,深圳曾是中国的诗歌中心[N]. 晶报,2015-10-17(A09).

[2] 徐敬亚. 徐敬亚诗选[M].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9:118,33-34.

[3] 王小妮. 王小妮诗选[M].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9:53,98,148,128.

[4] 乌沙少逸等. 边缘[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序,47-48,45.

[5] 谢湘南. 零点的搬运工[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3,69.

[6] 程鹏. 装修工[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9:100.

[7] 许立志.新的一天[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198-199.

[8] 邬霞.吊带裙[M].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9:3.

[9] 郭金牛.纸上还乡[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

[10] 邓一光.我的深南大道——深圳诗歌四十年[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20:155.

[11] 黄灿然.黄灿然的诗[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383-384,382.

[12] 孙文波.马峦山望[M]. 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135.

[13] 谢湘南.谢湘南诗选[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225.

[14] 献给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1978-2018)特别策划“诗篇”[N]. 晶报,2018-12-17(B03).

版权声明：©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